



目录

第一章 概 论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2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进历程	3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8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发展方向	13
第二章 学术思想	17
第一节 诸子百家之学	18
第二节 两汉经学	26
第三节 魏晋玄学	29
第四节 隋唐佛学	32
第五节 宋明理学	35
第六节 清代朴学	38
第三章 古代历史	43
第一节 王朝更替	44
第二节 史学历程	48
第三节 史学著作	54
第四章 教育科举	61
第一节 教育制度	62
第二节 科举制度	80
第五章 古代文学	89
第一节 诗 歌	90
第二节 散 文	98
第三节 小 说	108
第四节 戏 剧	116



第六章 传统艺术	121
第一节 书 法	122
第二节 绘 画	135
第三节 音乐与舞蹈	140
第四节 对 联	146
第七章 科学技术	151
第一节 古代科学	152
第二节 古代技术	169
第三节 近代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	174
第八章 传统习俗	177
第一节 祭 祀	178
第二节 婚 丧	183
第三节 节 令	195
第四节 日常习俗	209
第九章 古代建筑	213
第一节 宫 殿	214
第二节 寺 观	225
第三节 园 林	241
第四节 陵 墓	252
第十章 传统武术	263
第一节 发展与演变	264
第二节 主要派别	267
第三节 基本宗旨	275
第四节 价值与影响	276
参考文献	281



第一章 概 论

自从有了人类历史,也就有了文化,文化随着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演变,起承转合,汹涌向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历史上许多国家由于外敌入侵、内部倾轧、民族分化或者是各种天灾人祸,导致国运中断、民族消融、文化灭绝。如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希腊,一度创造了璀璨无比的文明和文化,最后却都无声无息地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此后,国家或者重生,文明火种或者再次燃起,但从本质上来说,均已不再是原来那一文化、那一民族。与世界其他各民族、国家相比,或许只有中国得天独厚,足够幸运,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而屹立不倒,其文化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 26 种文化形态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始终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立性、连续性、丰富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和包容性,称得上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文化。“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原本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观察天道运行的规律,用来了解时序的变化;观察社会人伦秩序,用来教化天下。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可见,“文”就是“文治”,“化”就是“教化”。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如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代束皙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王融《曲水诗序》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的“文化”均指的是“以文治、文德教化”的意思,是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的概念。

然而,今天人们常说的“文化”与“文治教化”的意思早已脱离了关系,现在人们说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词汇,是19世纪末通过日文从西方转译而来的,拉丁文为Cultura,英文、法文为Culture,德文为Kulture,本义为耕种、居住、加工、修养、教育或培育等义,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此后意义延伸,进而涵盖了神明祭祀、道德法律、精神修养诸领域。1871年,号称“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指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一定义,历来被认为是关于“文化”最经典的解释,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界定文化的内涵,关于“文化”的定义也越来越多,据统计,迄今至少有200多种,但没有任何一个定义可以获得人们的一致认可和满意。之所以如此,在于“文化”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非常不容易准确概括和把握,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对于“文化”的认识多少总会出现一些偏差,这造成了人们对于“文化”内涵理解的困难。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文化”可以从狭义、广义两种角度进行解释。所谓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纯粹精神创造的成果,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风尚以及它们的物质载体等方面的内容。上述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基本上属于狭义范畴。而广义的文化则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从这一方面来看,文化与文明基本同义)。广义文化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主要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从其内在结构层次和逻辑顺序来看,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层次。其中,物质文化又称器物文化,是由物化的知识构成,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事物。制度文化是由

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各种社会规范及准则,包括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制度、宗教民族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个人活动、团体组织等各方面的制度等等。行为文化主要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多数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孕育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是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所以又称为观念文化、精神文化,这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特质和民族风貌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的总和。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伦理、礼仪制度、历史教育、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生活习俗、科学技术及以上各方面物化形态等层次的内容。从狭义上来说,主要是指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融合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形成发展起来,具有汉民族特色的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教育科举、文学艺术、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内容。本书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以狭义范畴的文化为主,同时兼及广义文化的部分内容。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进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从孕育产生到繁盛强大以致最后衰退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夏商周之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时期

夏商周之前,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人们一般称之为上古时期,基本上等于考古学上所称的新石器时代。至于三皇五帝之前,可以一直追溯到上百万年前,中国境内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再到山顶洞人等原始人群的依次出现。原始人群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原始文化的产生,然而远古幽渺,茫乎无绪,故而人们记述历史,一般都是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三皇”一般指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五帝”指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皇五帝的时代,大概是公元前 15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即便按照《史记》“从黄帝始”记载的历史来看,也至少是在公元前 5000 年左右。有的历史研究者将这一时期归于传说时代,认为三皇五帝未必真有其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切传说甚至神话往往都有其事实根据,剥除后世附会的神话色彩,往往可以





发现接近史实的真相。《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段话，反映出当时畜牧文化、农耕文化已经有了初步发展，政治制度也已经有了初步的制定。关于禅让制以及黄帝蚩尤之战、炎黄之战的有关传说，也折射出当时政治、军事等制度文化的某些特征。

再从现代考古实证来看，这一时期发现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遗址，其中出土的石器、陶器、壁画等等，不但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发展情况，而且反映出原始宗教、艺术等精神文化状况。这些文化遗址分属于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呈现出以华夏文化为主的多元化文化状态。这一时期，虽然中国文化开始发端，但面貌还不够清晰，特征还不够明显，其社会组织结构、婚姻方式、经济生活，以及包括图腾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在内的精神生活，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基本一致。因此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

二、夏商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期

夏王朝建立，国家政权形成，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政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最早的历法——夏历产生，青铜器开始出现，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商朝青铜器制造技术更加纯熟，保存至今的商代青铜器，其精美程度至今令人赞叹。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特别是商代的甲骨文文字已很繁富，并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夏商之后，西周“制礼作乐”，实行宗法制、分封制以及以“亲亲”“尊尊”为主要内容的礼制，集中体现了周代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周代礼仪制度繁复而完备，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这种礼乐文化，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后来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认为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的，对周文化表示高度的赞赏。周王朝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敬天命而重人事”等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本文化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东周也即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征伐不休。春秋三百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然而，这一战乱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中国文化奏出了无比辉煌乐章。这一时期，士阶层崛起，私学出现，为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最突

出的就是诸子百家的出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以尊“天道”尚“自然”的道家、以强化法令刑律为主的法家、以“兼爱”“非攻”为主张的墨家、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的阴阳家等,百家争鸣,宣扬各自的思想学术观点,以“救时之弊”。《周易》《礼记》《诗经》《尚书》《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春秋》《左传》《楚辞》等大批著作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典,哲学、文学、史学全面繁荣,气势恢宏,凌驾百代,呈现出中国文化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局面。天文学、算学、医学、农学也都有一定的发展,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形成期,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三、秦汉魏晋六朝——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融合时期

秦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初步形成,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一统”,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实行统一,可以说,秦汉文化奠定了中华大一统文化的雄厚基础。秦始皇时代“地同域”“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在大一统政策下,多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强了。到了汉朝,一个统一的民族——汉族最终形成,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汉武帝时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取得“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并在此后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构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华夏民族文化的主干。汉代设“五经博士”,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经学遂成为两汉思想学术的代表。

这一时期,史学、文学、医学成就辉煌。其中,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历史著作,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汉赋作品,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诗歌,无不体现出宏观的文化精神,视野宏阔,情感深广,可称之为汉代文学艺术的典范,体现出大、重、雄、厚的汉代文化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混乱,朝代更迭频繁西汉以来以儒家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被打破,人们从政治强迫和集体约束中解脱出来,思维自由而活跃,进入了“人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时代,思想文化得到多元发展,生机勃勃,人的独立意识、审美意识和人性精神得到真正解放。这一时期,玄学崛起。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本源,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着重于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成为魏晋文化思潮的主流,其玄远旷达、洒脱不羁的个性自由精神对中国人的生态态度、生活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如书法、绘画、音乐、诗歌等,也都深受玄学的浸染,表现出对于山水之美、艺术之美、人物风度之美的高度乃至唯一追求。这一时期于是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对于美、对于艺术沉迷追求的时代,体现了中国文化唯美、唯艺术的一面。

这一时期,自东汉末年创立的道教和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得到广泛传播,渗透进了中国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对丰富中国文化、扩展中国文化





内涵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更加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

四、隋唐宋元——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时期

隋唐以来,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占据统治阶层数百年的门阀士族衰落。通过科举选士,大批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逐渐登上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满腔的热情。尤其是唐王朝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文化因而展现出一种明朗、昂扬、热烈、奔放、朝气蓬勃的时代气质,敢于创新,广泛吸收外域文化,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都被唐文化加以积极地吸收融合。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同时,唐文化还积极向外辐射,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这一时期,哲学、史学、文学、书法、音乐、美术、历法等全面发展,儒、道、佛三学并行不悖,互相汲取营养,丰富各自的理论体系,佛教、道教文化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修史之风兴盛,史学著作体例和数量显著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诗歌创作空前活跃,出现了一大批天才诗人,唐诗佳作多如繁星,诗歌艺术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唐代还是书法的黄金时代、绘画的极盛时期、音乐的融合创新时期。可以说,唐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全盛时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成就,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隋唐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向前,至两宋时期达到传统文化的顶峰。这一时期国家经济更加发达,政治体制更加先进,教育更加普及,科举规模更加扩大,更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走上历史舞台。理学开始兴起,理论思辨更加深微精密,标志着中国学术思想达到新的境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诗歌、书法、绘画等传统高雅文学艺术都足以媲美隋唐,并体现出新的特色。由于市民阶层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市民文化蓬勃兴起,出现了话本小说、杂剧这样的通俗文学,特别是杂剧,发展到元代,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元杂剧标志着传统戏曲艺术的成熟。除此之外,宋代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句话精辟地指出了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两宋时期以及蒙元时代,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进行了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激烈冲突,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了华夏文化,而汉文化则在冲突中产生了深刻的忧患心理并渗透于

宋文化的各个层面。隋唐时代那种开放、热烈的文化类型已不可复见,而是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样式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汉民族性格、社会风气,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内省、精致、婉约的风貌。

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迁居中国,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也流入中国。同时,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印刷术也传入中亚、欧洲。中国历法、数学、绘画以及瓷器、茶、丝绸等也通过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影响,但民族文化特色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五、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开始出现,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入侵,中国社会自身亦将会在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等方面发生深刻转变,开启新的时代。这一时代,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盛行的时代。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中国文化遭到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另一方面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压制思想自由,造成了思想文化的专制和僵化。明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兴起,高扬人的主体性,对程朱正宗统治思想造成强烈冲击,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明末清初,以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批判封建专制。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传入中国,启蒙思潮的曙光出现,但是在清朝统治阶级残酷的文化专制下最终湮灭,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才得以复兴。

这一时期,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期,同时又是传统文化的总结期。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的代表。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象征,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河防一览》等也都是各自领域的总结性著作,标志着封建社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文学艺术方面,高雅文学的诗歌、散文继续得到重视,作者、流派众多,各种传统的风格、理论主张都得到发掘和提倡,但基本上是围绕着尊唐与尊宋、拟古与反拟古这两种思潮展开可以看作是对于传统诗歌、散文的一种总结。通俗文学方面,明清传奇成就突出,成为古代戏曲的又一个繁盛时期,明清小说更是达到了通俗文学的顶峰,占据了此时期文化艺术的中心地位。通俗文学的兴盛和繁荣,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学即将开辟一个全新的时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激烈变化、政治经济的剧烈动荡,思想文化方面也开始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从此进入转型期。

从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条结论:一是文化的





发展总是受经济关系尤其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制约,同时,文化也对上层建筑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如战国时期中国进入铁器时代,农耕文明得到大大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科学技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汉代经学的兴盛源于独尊儒学的政策,而独尊儒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思想文化的大一统,从而保证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有密切关系,而科举考试则有利于下层优秀人才的选拔,打击了门阀士族,刺激了政治权力格局、统治方针的深刻变化乃至思想文化的融合交流。而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控制思想自由,则导致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全面落后。二是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特点,如两汉文化的宏大厚重、魏晋文化的自由唯美、隋唐文化的明朗刚健、宋元文化的精致内省、明清文化的承古萌新等等。但无论怎么改变,始终有一脉相承的中国精神贯穿其中,使其始终呈现出中国气质、中国风格,数千年绵绵不绝。三是中国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同化力、包容性和稳定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是外域文化,还是外来民族的文化,不论其在军事、政治上表现得多么强大,但最终都会被中原主流文化所同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开始中国化,禅宗更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又如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其固有文化受到先进汉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被同化,这正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落后民族以武力征服先进的民族,最终将会被后者所同化。”四是任何文化都要经历产生、发展、壮大到衰退的过程,如果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穷而不思变、思进、革新,文化就会落后并最终归于湮灭。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便是因为它不断地吸收多种外来营养丰富自身。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通断绝,传统文化呈现萎缩局面。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如果国人能够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便是中国传统文化蜕变新生的重要契机。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对西方文化盲信盲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价值过分忽略,从而使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面临着断层危机。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长期受到人们尊崇并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的思想观念和固有传统。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来审视,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它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从整体上分析,我们认为如下几个方面最具有代表性。

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重视人的生命,肯定

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本为中心,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嬗变,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派别、文化思潮的关注焦点,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实践等这些关于人的问题而展开。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自上古时代开始,人文精神已经开始萌芽,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实际上体现的正是对人的力量、人的价值的歌颂。西周时期,重人事、远天命,“重民轻神”的思想逐渐占据上风,“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观念的提出,在原始宗教的外壳里孕育着明显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得到独立的发展,并从此确定了在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种以人本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传统,后来得到儒家和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孝经》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清代戴震说:“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这些都突出了人的价值和地位,高度评价了人在宇宙中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本的人文精神同时体现在对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追求和推崇上。既然人的价值、尊严如此重要,那么,个人就应该努力加强道德修养,高扬个体在道德自省自律与道德实践上的主体性、自觉性,培养高尚情操,完善人格。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圣人”作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当然圣人的境界是难以达到的,但至少应该努力达到贤人、君子那样的道德境界。《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总目标,修身既是人生目标之一,更是其他三者的前提,只有修身养德、成就高尚完美人格,才能具有治理好家国天下的资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神本文化大异其趣。如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都认为世界是由神创造的,只有相信神才能得到救赎,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受到忽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天地万物精华之所钟,如老子曾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高度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认为人在宇宙中并非渺小和无足轻重。即便是中国宗教本身,也有一种重视人自身的人文精神隐含其中。如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生命在此岸的价值极受重视。中国佛教禅宗提倡“顿悟成佛”,人性即佛性,修行无须出家,肯定了人的现世价值。这些特点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体现之一。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相同。一者,中国传统文化在强调以人为本时,很多时候指的是以民为本,将民众作为管理国家的根本,强调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君为舟、民为水,本固才能邦宁。二者,中国传统文化在强调重视人的个体价值和尊严、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时,往往指的是精英知





识分子即“士”的价值和尊严,而往往不是泛指所有人尤其是一般下层民众的个体价值和尊严。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提倡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则注重的是所有个体的价值,强调一切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个性主义。二者之间由于时代、社会的区别,存在着实质差异。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客观上对于重视所有人的权利、自由和价值尊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重视人伦的伦理精神

所谓人伦,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重心是尊卑长幼的关系。自西周制礼作乐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复杂有序的伦理制度,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等等。其中,“三纲”指的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礼记·含文嘉》解释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的是指“仁、义、礼、智、信”。“五常”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五伦”指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六纪”指的是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些伦理纲常,对人与人之间,人与宗族、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成为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中,对于规范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意识形态,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伦理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精神。

如果再进一步概括,中国一切的伦理规范,不外乎四个字:忠、孝、仁、义。“忠”指的是忠于君主。忠是一切人伦的最高原则,在君权即政权、君主即国家的时代,忠于君主基本上也就是忠于国家,所以古代往往把忠君爱国连在一起。“孝”指的是孝敬父母长辈。孝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只有孝顺父母,才可以谈得上忠于国家、友爱兄弟、关爱他人。中国古代向来认为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历朝历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从对父母尽孝上升到为君父尽忠,尽忠其实也就是尽孝。“仁”是对他人的关爱、同情和怜悯。“义”是讲道义、信义。儒家对仁义具有多方面的深刻论述,坚守仁义也成为中华民族最可贵的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显著特征之一。

伦理精神、伦理观念深深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教育等一切领域中,并且通过它们表现出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鲜明的特点之一。中国古代的政治其实就是伦理政治,“人道亲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国家统治的理论基础;各类文学作品中的褒扬、推崇或者批判、否定都依据这些伦理原则而展开。从先秦的孔孟之道一直到宋明以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始终把伦理教育作为中心,以“明人伦”为宗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伦理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伦理道德规范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国家、社会的义务,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国家的稳定,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这种伦理原则又特别强调君主和家主、族长的绝对权威,强调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

民主思想的发展,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三、贵和尚中的和谐精神

“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庸》强调:“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贵和尚中,即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这是中国文化的又一基本精神。

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和谐统一,是贵和尚中思想的侧重点。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认为在礼制当中,“和”是最重要、最优秀的品质。但“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所以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主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弟之间讲“悌”,朋友之间讲“信”等等,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局面。中国古代的“贵和”思想,往往是和“尚中”之义联系在一起的。“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中”就是指事物的“度”,尚中的观念即“中庸之道”。孔子把它称作最完美的道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程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们在为人处事上思想和行为的适度 and 守常,做到孔子倡导的“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尚中道,行中庸,从而达到万事和谐的完美境界。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贵和尚中的精神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中国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政治上,人们重视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经济上,主张“百姓时和,事业得叙”“不患贫只患不均”;思想方法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个人修养上主张“从容中道”,“文质彬彬”;艺术上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美学上主张“以和为美”;戏剧文学上“大团圆”的结局等等,都是在强调“中”“和”。

贵和尚中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凡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整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但不足的是,过分强调贵和持中的观念,有时候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凡事走中间路线,压抑个性和斗争精神,抑制竞争观念和创新思想,形成与世无争和知足保守的落后心理,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少不利影响。

四、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坚忍不拔,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精神,也





是中国人积极进取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周易》对此有最经典的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那么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一种奋斗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努力克服一切苦难障碍。

刚健有为、积极进取是人们对自身力量坚定信心的表现，是对自身价值和追求目标的高度肯定。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强调的都是人要有坚定、自由的意志，要有担当道义、百折不屈的社会责任和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孔子弟子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指出知识分子要有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而刚毅进取、矢志不移。为了坚守自己的原则，甚至要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是这种自立自强、无所畏惧的刚健精神的极致表现。

刚健有为、积极进取还包含着积极入世、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和实现个人价值、为世人谋取利益的主动创造精神。纵观世界，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文化普遍存在着消极出世这一共同特点，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则是积极入世的。不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的儒学，乃至程朱理学，其主旨都是经世致用、教民化俗、兴邦治国。其主要信条，如“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德、利用、厚生”，“要言妙道不离人伦日物”，都体现出将内在修养外化为积极事功的入世情怀，体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应尽的贡献的高远追求。

中国文化中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成为中华精神的写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激励着华夏人民奋发向上、勇往直前，坚持与内部恶劣势力和外来侵略压迫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并赢得最后的胜利，成为华夏民族数千年屹立不倒的重要精神支柱。它所表现出来的坚持独立人格和高贵气节，不为物质利益或暴力所诱惑、所屈服的顶天立地的精神，也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

五、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异于西方哲学的最显著特征。所谓天人合一，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宇宙自然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这两层意思的共同点都在于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立关系之中，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相互统一的关系之中。

在人与自然(天)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儒家和道家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强调天人和谐、天人合一。道家主张“任自然”，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则是最高法则。庄子强调顺应天性，“不以人助天”，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经典《周易》中的卦象都是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周易·系

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从自然现象的体认中揭示社会人生的玄机。《易传·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德行高的“大人”通晓、掌握宇宙自然万物的根本规律，所以应该一方面调整、引导自然，另一方面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中庸》提出：“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圣人能够尽量了解自己的本性，也就能了解天地万物的本性，这样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以达到天人和谐一致。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人副天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把天、地和人看作是一个全息同构的体系，一切社会结构、政治现象都与天相对应，形成了具有神秘特色的理论体系，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虽然其中有谬误，但客观上也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地位得以牢固树立。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医学中的人天同构、人天同象理论，传统饮食养生学天人相应、调补阴阳的养生学说，书法艺术对线条和取势的讲究，绘画艺术气韵和以形写神的注重，古典园林的布局和设计，太极拳负阴抱阳的拳法要旨等等，无不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

“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对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 with 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征服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求，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外，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相对的本体，不是宰制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发展方向

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独领风骚，以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取得了不可复制的辉煌成就，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东亚和东南亚文化圈。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17 世纪前世界创造发明的总量中，75%是由中国做出的。从启蒙运动时代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大力推崇，到 20 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以及李约瑟等英美思想家表现出的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都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优秀特质。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弊端,如专制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平均主义等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缺少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吁“德先生”和“赛先生”,正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缺陷。由于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伦理制度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逐渐形成了因循守旧、盲目自大、闭塞保守、缺乏竞争意识的特点。近现代以来,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反复比较和冲撞中,中国传统文化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进步,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
意义
来源:爆米花网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得到了高速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文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西方文化俨然成为普世价值,中国也深受其影响。但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种危机和冲突,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人与人的冲突所造成的道德危机、

人与自我心灵的冲突所造成的精神危机、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价值危机,这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和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由于价值体系混乱、道德崩溃、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人们对人类前途日益失去信心和希望,感到困惑迷茫、压抑忧虑、无所适从。心灵的无所依归直接导致社会上暴力冲突不断发生,自私冷漠案例让人震惊。人们从西方文化中找不到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的方法。或者说,正是西方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观最终导致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的发生。当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人们开始将视野转向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得到重新评价和发现。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汤恩比提出了一个令全世界深思的论点:“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198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瑞典人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以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孔孟学说是什么呢?就是仁爱、中和与大同;大乘佛法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慈悲、对芸芸众生一致的善和爱。唯有此二者的爱和慈悲之心,才能重塑人文价值体系,才能维护人心的平和、安静和善念,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才能促进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联合国大厅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正是对全世界体悟儒家仁爱之心的倡导和呼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是军事竞赛,20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经济竞争,那么21世纪的主流则是文化的竞赛。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对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谁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提升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国家战略。因此,提升我国的国家文化影响力,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思想界已经进行了多次论争,提出了各种观点:一是国粹主义的“中体西用”论,二是照搬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三是持调和和折中立场的“中西互为体用”论。第一种观点,历史已经证明失败了。第二种观点片面夸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主张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整个文化模式,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的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第三种观点将中西文化二元对立,两种文化系统机械拼凑,不伦不类,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现在人们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综合创造论”,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造”的方法,以中国民族文化为主,吸取西方文化精华,创造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一观点是符合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要求的。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改头换面,也不是中西文化的简单拼凑或西方文化的单纯移植。事实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磨难和转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动摇,核心的价值体系、文化观念正在或者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近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思潮全方位渗透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受到了严重挑战。我们在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传承、改造和转换,重新塑造民族形象、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通过文化的传承创新,整合资源、凝聚意志、形成共识、提振精神,使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中华大地,焕发崭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精神动力,谱写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思考题

1. 什么是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是什么?
2. 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关系。
3.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哪些?
4.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重要意义?
5. 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是什么?

